

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身世 及其於日本早期活動考證

劉小珊* 陳曦子**

耶穌會士陸若漢出生於葡萄牙。關於他的家世、家人以及他幼年時代的經歷均無詳細記載。或許因為他出身貧寒，有別於許多豪門世家出身的貴族傳教士，或許因為他十三四歲就離開葡萄牙、在亞洲度過五十多年歲月而再未返回故國，在耶穌會教會文獻中對他的記錄很不完整，會員名冊中也沒有準確的記錄。根據日本史料顯示，當時耶穌會士攜帶童僕赴東方是很普遍的事情，少年陸若漢也許是以此身份來到日本的。

陸若漢在故國沒有受過早期教育，他的全部知識都來自耶穌會在日本的教會學校。從他此後被賦予編纂《日本教會史》的使命來看，陸若漢似乎更充分地展現其過人的天賦。此外，陸若漢成功地作為日本教會的“通辭”負責與豐臣秀吉等日本統治階層進行交涉工作，擔任日本副管區司庫的重要職務，從而確立了他在耶穌會內部之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陸若漢，葡文名João Rodrigues，譯名若阿·羅德里格斯，葡萄牙耶穌會士，16-17世紀著名的“南蠻通辭”（葡萄牙語翻譯），生於1561年，卒於1634年。

作為一個出身低微的葡萄牙青年，陸若漢在故國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經過耶穌會日本教會學校的培養，他成功地作為一名“南蠻通辭”得以與日本江戶時期的兩任權力者和許多掌握重權的人物相識相交。

歷史的大背景造就了這位先後受到豐臣秀吉、小西行長、德川家康、前田玄以、本多正信等眾多位高權重者的知遇，備受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的信任和寵愛，被認為是“有才能、知遇了活躍於16世紀末17世紀初當時所有政治家”的耶穌會傳教士。⁽¹⁾

陸若漢的家世、家人以及他的幼年時代經歷均無詳細的記載，或許是因為他出身貧寒，有別於許多豪門世家出身的貴族傳教士，或許是因為他十三四歲就離開葡萄牙，在亞洲渡過五十多年歲月而再未返回故國。陸若漢在葡萄牙短暫的生活經歷儘管有史學家偶爾提起，材料頗零星散亂，教會文獻中對他的記錄更是不完整。根據其姓名，有人推測“他也許是10世紀塞爾南賽尼埃城的城主弗拉姆拉羅德里格斯夫人的子孫”⁽²⁾，而實際上，“若阿或是羅德里格斯，在葡萄牙都是極其普遍的洗禮名”⁽³⁾，這個姓氏分佈很廣，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有。國內外史學界傾向於認為，陸若漢祇是出生於一個農民家庭的孩子，他缺乏早期教育，不具備優雅的氣質。其證據之一是：由於貝拉地區的

* 劉小珊，歷史學博士，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語學院教授。

** 陳曦子，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社會研究科，傳媒學專攻，博士課程二年級，研究方向：大眾文化、中日文化對比研究。

方言晦澀難懂，少年時期未受過良好教育的陸若漢，日後雖具有過人的語言才能，卻終身為自己的母語用語粗俗、寫不出優美而標準的葡萄牙語文章苦惱不已。⁽⁴⁾

據推測，陸若漢出生在葡萄牙貝拉 (Beora) 丘陵地帶的塞爾南賽尼埃 (Sernancelhe)⁽⁵⁾ 鎮一個叫做金特拉達拉帕 (Quintela da Lapa) 的地方。法國人費賴之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稱：

若漢1561年生於葡萄牙拉美古 (Lamego) 教區之塞南賽勒 (Sernancelle)。⁽⁶⁾

土井忠生在《日本教會史》解說中提到：

若阿·羅德里格斯，拉美古司教區塞爾南賽尼村出生的葡萄牙人士。⁽⁷⁾

土井忠生又有詳說：

日本文典的著者若阿·羅德里格斯1561年生於葡萄牙中部山嶽地帶、屬於 Beira 的 Lamego 司教區的 Cernancelte。他來到日本之前的成長經歷全然不明。⁽⁸⁾

陸若漢曾在自己六十六歲高齡時寫給羅馬的信中稱：

感謝你們 (羅馬教會) 對我這個來自塞爾南賽尼埃的拉帕聖母之鎮教士的厚愛，我之所以這樣自稱，是因為我是在那裡長大的。⁽⁹⁾

四份史料提供的資訊大致相同，僅在地名的書寫和翻譯上稍有差別：費賴之譯為 Sernancelle (塞南賽勒)；土井忠生書中是 Cernancelte (塞爾南賽尼埃)；庫帕則為 Sernancelhe (塞爾南賽尼埃)。從1588、1593、1616各年做成的耶穌會會員名冊三來看，陸若漢的出生地都是貝拉教區塞爾南賽尼埃。對此地，庫帕 (Michael Cooper) 考證稱：

若阿·羅德里格斯於1561年出生於葡萄牙的塞爾南賽尼埃。塞爾南賽尼埃是葡萄牙北部邊遠地區人口一萬人的城鎮，鄰接流經一個名叫拉美各 (Lamego) 小鎮的東南方約25英里處的達吾拉河的東岸，位於距奧波爾圖 (Oporto) 東面40英里的地方。⁽¹⁰⁾

土井忠生談及陸若漢的出生地時，如此描述道：

他 (羅德里格斯) 的出生地貝拉地區是葡萄牙中部的丘陵地帶，這裡出生的人多為田舍農民，一般體格健壯。貝拉方言處於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之間，沒有特別的區域劃分，不如北方方言那樣古色古香，非高雅語言之類。⁽¹¹⁾

土井忠生進一步稱：

通辭伴天連若阿·羅德里格斯出生於葡萄牙拉美各司教區的塞爾南賽尼埃村。該地位於葡萄牙中部，貝拉地區北部邊界附近，連接着山區。貝拉人都不夠文雅，但是性格倔強，據說是典型的鄉下人。⁽¹²⁾

陸若漢晚年也回憶說，自己是“一個粗野的貝拉人，不具備撰寫漂亮流暢葡萄牙語文章的能力，貝拉地區是有名的方言色彩濃厚的地區”。沒有在祖國接受過很好的早期教育的陸若漢似乎一輩子都為出生地的方言而感到煩惱。⁽¹³⁾

陸若漢的出生年月，在耶穌會的會員名冊中沒有準確的記錄，僅附有傳教士們的年齡、工作、住處，但“當時會員名冊上的有關記錄都很模糊，編寫者的認真態度，記錄的準確性，都值得懷疑”⁽¹⁴⁾。陸若漢的年齡在很多書中都有記載⁽¹⁵⁾，綜合各種記錄來看，可以推算他是1561年出生的，具體的月份和日期已無從知曉，正如庫帕考證所稱：

羅德里格斯是一個貧困的、沒上過學的少年，出生在葡萄牙的一個小村莊裡。所以，連他本人大概也不知道自己的準確年齡。⁽¹⁶⁾

土井忠生對此也有推論：

耶穌會為協助傳教士的工作往東洋輸送孤兒，或許他（羅德里格斯）是其中的一人。⁽¹⁷⁾

土井忠生進一步稱：

羅德里格斯通辭來日本之前的經歷完全不知道。來日本的日期根據文書的記述也未必準確，出生年代也同樣，祇能依靠推測。但至少可以認定他1576年已到達印度，在日本登陸的時間是在1577年。⁽¹⁸⁾

陸若漢本人在《日本教會史》第一卷第十三章證實了以上諸種推論：

最初踏上日本的土地是否長崎不敢確定，但1578年夏天自己的確呆在豐後。領主大友宗麟那時期正接受洗禮，一個月後，大友宗麟援助被島津氏攻擊的伊東氏，同時胸懷開闢吉利支丹新天地的夢想，率大軍向日向發起了進軍。⁽¹⁹⁾

戚印平在其相關論文中提出其見解：

陸若漢在弱冠之年前往東方之事，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後來盛極一時的奴隸三角貿易。關於這兩者間是否有某種關聯，我們還可作進一步的研究，但它至少證明，在15-16世紀的所謂大航海時代，西方列強不僅販賣過亞洲和非洲的兒童，而且亦沒有放過本國同胞。當時曾有許多的歐洲青少年、尤其是陸若漢那樣的孤兒，在並非自願的情況下，像豬仔一樣被帶往遙遠的東方，成為傳教士（應該還有商人）的侍從與助手。⁽²⁰⁾

陸若漢是否的確如戚文所稱慘遭被販賣的厄運，不得已來到日本？這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這個年幼的歐洲鄉村少年，為甚麼要踏上前往亞洲這個當時被認為十分危險的旅途，這一點不清楚。本研究認為陸若漢嚮往同許多葡萄牙青少年——特別是孤兒們一樣，做一個在亞洲各地工作的傳教士的童僕而自願走上這個旅途。1597年在長崎受刑的方濟各會殉教者岡薩洛加爾西亞（Gonçalo Garcia）就是一個先例。他十五歲時來到日本，在耶穌會傳教士們的身邊當童僕、翻譯⁽²¹⁾，直至後來成為傳教士。耶穌會士招募一些年輕的自願者一同前往亞洲開發新的教區，一方面耶穌會需要培養新生力量來擴大本會的勢力，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耶穌會當時的傳教士人數遠遠不能滿足遠東傳教的需要，這點在後面也有提及。因此，陸若漢、岡薩洛加爾西亞，以及其他同命運的葡萄牙少年極大可能是受耶穌會前輩的影響，憑藉對宗教的狂熱、滿懷出人頭地的抱負踏上赴亞洲旅途的，並非被自己的葡萄牙同胞當作“豬仔”販賣至日本。目前所接觸到的日本史料顯示，耶穌會士攜帶童僕赴東方是當時一個很普遍的事情，與東方的奴隸三角貿易有着本質的區別。另外，陸若漢的有關自述也可以進一步佐證本觀點。⁽²²⁾庫帕對葡萄牙少年踴躍追隨耶穌會傳教士赴亞洲一事亦有論述：

儘管如此，到亞洲傳教從來都不缺少志願者。一位後來跟羅德里格斯（陸若漢）一起工作的意大利籍傳教士就是請求他的上級派他到亞洲去的。⁽²³⁾

葡萄牙山區的人們都長就一副結實健壯的身子骨。的確，憑着十三四歲的年輕身板若要平安經受從葡萄牙到亞洲的艱難旅程，身心必須非常堅強才行。據耶穌會士法蘭西斯克·維艾拉（Francisco Vieira）於1619年所寫的私信中稱，少年陸若漢到達日本的日期是1577年⁽²⁴⁾，即日本

天正五年到達日本島。陸若漢本人也在由長崎寄出的信中確認了這一點。他寫道：“自己在日本長大成人，已經在日本呆了二十一年。”⁽²⁵⁾1622年又從澳門報告說：“自己在四十五年前來到日本。”⁽²⁶⁾

如上所述，陸若漢在葡萄牙的生活經歷十分短暫且很不清晰，土井忠生如是說：

羅德里格斯通辭受遙遠的他國語言教育成長，在故國沒有獲得掌握學識教養的機會，少年時代他便到了國外。(……)身為一個葡萄牙人傳教士，羅德里格斯卻因為故鄉的語言煩惱了一生。⁽²⁷⁾

二

當時從歐洲到日本長崎的海上旅行，即使是在最好的條件下，也要花上兩年多的時間，故此陸若漢在1575年之前應該已經離開前往亞洲的葡萄牙唯一的港口里斯本。少年陸若漢是以甚麼樣的身份來到印度，然後又登上日本島的？按他的年紀來看不會是一個天主教的傳教士，這一點可以肯定，而極有可能是作為傳教士的童僕，或者出於天主教教會的某個目的被選送到了日本。

有一位在里斯本開設孤兒院並因此德高望重的佩德羅·德梅奈克(Pedro Domenech)神父曾經在1550年受命於葡萄牙國王約翰三世，從孤兒院撫養的一百六十名失去親人的少年中挑選出七人送到了巴西的傳教士身邊；後來，又得到命令，將九名孤兒送到印度，進入在果阿(Goa)、巴賽(Bassein)和戈蘭加諾爾(Cranganor)的三所天主教學校，每所學校三人。少年們在那裡學習做彌撒，學習語言當翻譯，並作為當地孩子們的榜樣，協助進行傳教工作。⁽²⁸⁾這些孤兒中有一名出身里斯本、名叫吉里埃爾默·貝雷伊拉(Guilherme Pereira)的年輕人，他跟另外四名少年於1556年登上日本的國土。此正如傳教士努奈斯巴萊德(Nunes Barreto)所寫：

他們的任務是莊嚴地歌唱、祈禱，並為從羅馬到日本來的神父們充當翻譯。⁽²⁹⁾

貝雷伊拉到日本兩年之後加入耶穌會，直到1603年去世為止，作為傳教士在日本各地巡查，從事傳教工作達四十五年。由於他日語非常流利，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在耶穌會士瑪特烏斯德·考諾斯(Mateus de Couros)執筆的死亡記錄中有這麼一句話：

吉里埃爾默·貝雷伊拉の日語極好，說話就像日本人一樣。⁽³⁰⁾

陸若漢與貝雷伊拉至少有四個共同點：首先，兩人均為葡萄牙人；其次，少年時代就渡海來到亞洲；再則，兩人都是到日本後才加入耶穌會的；第四，他們都能說一口流利的日語。從這些共同之處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陸若漢的身世——“或許也是個孤兒”⁽³¹⁾，在故土得不到學習和受教育的機會，年少便離開葡萄牙偏僻的小鄉村，從某個孤兒院被選送往國外，充當在亞洲工作的傳教士們的童僕。陸若漢本人則稱：

是主將幼年的我召到了日本的主自己的會(耶穌會)。⁽³²⁾

1610年陸若漢被驅逐到澳門以後，他曾提出希望回到“少年時接受使命的”日本耶穌會的請求。⁽³³⁾但僅根據陸若漢本人的兩句話，不能確定年輕的他從一開始就接受了教會的使命。一種可能是他因為想要脫離歐洲鄉村的生活、成為一名天主教傳教士而離開葡萄牙的；另一種可能是他到達日本之後，為耶穌會士的生活所吸引而最終走上傳教道路。

當時葡萄牙少年們前往亞洲的最簡單辦法就是偷渡，甚至常常被謊稱是士兵和水手混上遠航船，儘管這些青少年完全沒有特技和經驗。乘坐

過在里斯本和印度之間定期往返的大型帆船到達果阿的法國人弗朗索瓦·皮拉爾 (François Pyrard) 曾記述道：

士兵全部都是從老百姓或身份卑賤的父母親那裡招募來的十歲到十二歲的孩子。說是士兵，但大部分都很年幼，沒有經驗，連武器都拿不動。航程中有的暈船，有的生病，一點用處都派不上。⁽³⁴⁾

弗朗索瓦·皮拉爾的“士兵都是孩子們”的說法未免誇張，不過當時在加利翁船上，像他所描述的葡萄牙少年最多時竟達到全部水手的一半左右。對此，庫帕也有考證：

少年們胡亂地睡在主桅杆和前桅杆之間的空間裡，被當成最下等的人。力小的做打掃工作，力大的操作水泵，有時被當作船醫、木匠、防漏水工或是木桶匠的助手和徒弟。天一放亮，少年們就必須在甲板上集合，用一個小時的時間，代替乘客和職員唱誦讚美歌，另外，進行祈禱也是他們的工作。⁽³⁵⁾

不管少年陸若漢是以怎樣的身份來到日本，他一定是經歷過漫長而嚴酷的航海旅行的。即使他乘坐的是大型的兩千噸級的大帆船，航行中仍然會充滿驚險和艱辛。當時的航海技術還處於精確測定經度的羅盤尚未發明的初步階段，如果船偏離航線，就會面臨於地圖上沒有標明之海域沉沒的危險。海上的航行主要依靠船長的運氣、技術和經驗來決定是否成功；此外，還依賴於有經驗的領航員根據水面漂浮的海草顏色，以及在每一海域飛翔的海鷗等鳥類的顏色和種類來判斷船舶所處的位置是否危險；有的領航員則通過閱讀前人留下的航海日記，參考他們的經驗和教訓。依靠這樣簡陋的行船機器和模糊不清的航海指南，每年至少有四、五艘大帆船遠洋航行，最終平安到達果阿，現在想起來令人不可思議。不

過，很多船隻雖然最終到達果阿，但“往往船體都已經變得破爛不堪”⁽³⁶⁾。

另外，船上的生活極其惡劣，令人難以想像。如庫帕所稱：

乘客和船員大都擠在狹小的空間裡，衛生設備極差，幾乎沒有廁所，伙食都是一些令人難以下嚥的東西。⁽³⁷⁾

飲用水和葡萄酒都依靠每天的配給，食物更是每個月祇能分到極少的一部分。船上的鹹肉由於熱帶高溫變壞腐爛，發出一股難聞的臭味。旅行家林斯霍頓 (Linschoten) 回憶說：

不僅僅是食物腐爛，在炎熱或船航行不順利的時候，船上的水都發出一股臭味，大家不得不擰着鼻子喝水。⁽³⁸⁾

當時的英國船和荷蘭船比較乾淨，而西班牙船和葡萄牙船卻髒得令人窒息，到處都是垃圾，疾病很容易就蔓延開來，這應該就是每次航程都要死掉很多人的原因之一。皮拉爾 (Pyrard) 稱：

這些船實在是大髒了，發出一股惡臭味，死亡率也特別高。這些都已經不足為奇了。有時一艘船在到達果阿之前，要死掉好幾百人。⁽³⁹⁾

曾有一個搭乘了一千多乘客和船員的船隊，在歡送的禮炮、祈禱、高唱讚美歌的隊伍和嘉年華化裝隊伍的歡送下，浩浩蕩蕩離開里斯本的港口，但航行中由於敗血症和痢疾蔓延，很多人身體變得極度衰弱，當六個月之後船隊終於到達果阿時，活下來的已經不足兩百人。⁽⁴⁰⁾

此外，遠洋航行中遭受的苦難不僅限於糟糕的食物和傳染病，更由於船員和士兵大都是烏合之眾，在這種發出各種怪味、擁擠不堪的船艙裡，紀律失控、偷盜、打架的事情幾乎每天發生，常有人被指控有罪而被綁在柱子上遭受鞭笞。

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海盜和風暴。從葡萄牙船的亞洲通航年鑒中可以看到如實的描寫：瓢潑大雨和山一樣高的巨浪，還有淒厲的暴風，連續多日襲擊船隊。從1579年到1591年的十二年間，在葡萄牙到印度的航線上，船舶沉沒二十二艘，損失了許多生命和貨物。從1580年到1640年，去印度途中下落不明的加利翁船約有七十艘，回來時由於裝載了不計其數的商品，所以有更多的船隻沉沒或是失蹤。⁽⁴¹⁾

1574年，第一次離開里斯本、經歷了類似嚴酷航行的耶穌會巡視員范禮安談起那次航行時回憶道：

（我們）被關在狹窄的船艙裡，吃的是腐敗的食物。不知不覺中就迎來了長達兩個月的寂寞而平靜的季節，船上變得悶熱起來，使人難以呼吸，衣服都濕透了，從來也不會乾，而且缺乏飲料水，流行着討厭的疾病。⁽⁴²⁾

范禮安記錄了亞洲航線上發生的一些危險事件：到處隱秘的令船擱淺的淺灘、連續多日的狂風驟雨、突如其來的海盜襲擊等等。很多西方人帶着淘金夢踏上前往亞洲的旅途，他們中的某些人甚至“來不及整裝，祇拿着兩條麵包、一塊乳酪、一瓶菓醬就上了船”⁽⁴³⁾。或許他們以為很快就能到達彼岸，沒料到將要面臨和伴隨的是風暴、疾病、饑餓甚至死亡。在當時的記錄中，偶爾也記載一些遇到好天氣、經歷一次較為愉快旅行的內容。不管航海旅行是怎樣的情形，總之，當時遠航船上的生活處於一種原始的極其艱苦的狀況，乘客和船員要依賴健壯的體魄才能經受住風浪的各種考驗。

迄今為止，史學界對陸若漢離開里斯本的日期並無明確考證，而在陸若漢1577年到達日本這一點上意見較為一致。若如此，則他最遲在1575年春天之前要離開葡萄牙，在同年下半年到達果阿。1574年，曾有一支船隊把范禮安及其他四十一名耶穌會士送往印度，有看法認為陸若漢當時

就在五艘船中的一艘船上。主要的推測理由之一是，陸若漢“後來可以作為一名親信被選中擔任范禮安跟日本權威人士交涉時的私人翻譯，從這一點考慮意義並不尋常”⁽⁴⁴⁾。陸若漢是否的確也乘坐這一批船來到亞洲，儘管不確切，但跟陸若漢一樣，於1577年到達日本的十四名耶穌會士中（七名司祭和七名修道士），至少有五人——佩德·洛拉蒙（Pedro Ramón）、法蘭西斯科·卡萊翁（Francisco Carrion）、葛列格里奧·德·塞斯佩德斯（Gregorio de Cespedes）、法蘭西斯科·德·拉格納（Francisco de Laguna）、巴爾特羅美烏·萊頓德（Bartholomeu Redondo）是在三年前跟范禮安一起離開里斯本的。故此認為陸若漢也是1574年乘上離開里斯本的船、在耶穌會傳教團的帶領下前往印度的推測也不無道理。這支船隊3月10日離開里斯本，7月14日到達莫桑比克，9月6日順利到達果阿港。庫帕稱：

一行人到達長崎是1577年7月4日，當時天主教徒們的歡迎場面非常壯觀，有的人跑到齊胸深的水中，來到傳教士們的面前，搶先接受祝福。搭乘同一條船的十一名商人看到這個場面深受感動，當場就向耶穌會提出了入會的申請。⁽⁴⁵⁾

三

1577年，即陸若漢來到日本那一年的活動情況不甚清楚。也許呆在長崎休養，“由於多數船員和乘客到達時，樣子都非常慘，所以不得不在當地醫院休養一陣子”⁽⁴⁶⁾。之後，陸若漢有可能在葡萄牙商人家裡當童僕。在當時的屏風畫裡，就畫有在長崎停泊的大帆船中幹雜活的少年。⁽⁴⁷⁾但更大的可能是作為傳教士的弟子，那麼，他也許就住在傳教士加斯帕爾·維萊拉（Gaspar Vilela）建造的“諸聖人”會館。

陸若漢來到日本最初兩年內的經歷，比較清楚的，一是訪問京城，二是目睹“耳川戰役”。另外，這一期間陸若漢去過京城這點毫無疑問，

因為在他的大作《日本教會史》裡，有關於古都京城的詳細描寫，其中提到：

自從師父(法蘭西斯科·札皮埃爾)於1551年從日本去了印度以後，過了二十六年來到日本的京城，參觀了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⁴⁸⁾

從以上描述看，似乎陸若漢去京城和到日本的時間是同一年，即他到達日本的1577年的下半年，或1578年初便去了京城。

第一個到達日本京城的耶穌會士是法蘭西斯科·扎皮埃爾(Francis Xavier)。1551年1月扎皮埃爾欲通過拜見天皇，爭取在日本全國傳授天主教的許可，但事與願違，他沒得到拜見天皇的機會。之後的1559年，加斯帕爾·維萊拉也前往京城，在此地工作一年半時間，沒有取得傳教的成果。1565年，曾一度因戰亂離京城而去的路易士·弗洛伊斯(Luís Fróis)再次回到京城，於1569年3月終於在京城修建一個小教堂，跟阿爾干奇諾(Gnecchi Organtino)一起開始傳教。弗洛伊斯是葡萄牙人耶穌會士、陸若漢之前的耶穌會首任南蠻通辭(葡語翻譯)，所撰寫的《日本史》具有很大的影響力。1576年，意大利人傳教士喬萬尼·弗朗齊斯克斯·蒂芬尼(Giovanni Stephanonio)取代了弗洛伊斯在京城工作。⁽⁴⁹⁾

陸若漢剛經歷過漫長艱辛的航海，又即刻踏上前往京城的長途旅行的原因不得而知。若當時他是耶穌會的弟子，隨同傳教士們訪問京城的可能性很大，因為之前“在京城的一個角落已經出現天主教村”⁽⁵⁰⁾。不管出於何種原因，造訪京城的陸若漢初次見到的是一片令人悲哀的廢墟，曾經號稱具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京城已經變成紫氏部在《源氏物語》中所描述的無人城鎮和戰場：

(是一所)具有燦爛的表象，但已是絕跡已久的無人城鎮。皇室的威望已經衰落，天皇祇是徒有其名，京城已經變成了想要奪取天下的野心勃勃的大名們的戰場。⁽⁵¹⁾

陸若漢在《日本教會史》中惋惜地記敘道：

城市的大部分已經遭到破壞，殘留下來的房屋以及所有的東西都讓人見了極其痛心。⁽⁵²⁾

根據陸若漢在《日本教會史》中的記載，京城位於三面環山的廣闊平原，由於模倣傳統的中國建築風格，非常注重建築的對稱。皇宮座落於整個城市的北半部分，四周環繞着重臣貴族的宮殿住宅。曾經輝煌的宮殿在不斷的內戰和叛亂的破壞下已經滿目瘡痍。陸若漢所見到的京城，僅有貫穿南北的一條大道，以及交叉的兩三條馬路可以通行。一個歷史悠久、繁華一時的京城其時的面積僅僅為其鼎盛時期的十分之一，跟一個中等的城鎮規模不相上下。衰敗的京城似乎反映了同樣衰落的天皇家境，陸若漢在《日本教會史》中如實地描寫出天皇家的衰敗情景：

天皇和公卿的宮殿是用老朽的松木建造的破房，牆上釘着松木板。公卿的生活看上去非常清苦。皇宮是用蘆葦和粘土壘起來的，非常陳舊，好像馬上就要倒塌似的，四面通風，一片破敗的景象。因為沒有人守衛，所以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出入。⁽⁵³⁾

據說當時正親町天皇⁽⁵⁴⁾邀請在軍事、政治力量都非常強大的尾張的大名織田信長來完成天下統一的大任。此時的將軍名義上是1568年就任第十五代足利義昭，他原本是在信長支持下當上將軍的，1573年由於他試圖輕率地推行自己的主張，結果被廢黜，直到去世為止，被迫過了二十四年的隱居生活。這樣直到17世紀初，將軍的職位一直空閒，統治着日本六十六州中半數領地的織田信長自然而然地成為最高的統治者。織田信長曾對傳教士誇口道：

掌握實權的是我，天皇和將軍說的話沒必要聽，祇要按我說的去做，你們（傳教士）到哪兒去都行。⁽⁵⁵⁾

織田信長一直支持天主教，曾多次召見被叫做南蠻人的歐洲傳教士和商人，和他們親密交談。⁽⁵⁶⁾另外，織田的友好還體現在傳教士在京城建造教堂一事上。當時信長正投入極大的人力、物力以努力恢復京城的面貌，故禁止用地動資建造更多的私有房產，但當耶穌會提出在京城建造教堂的計劃時，京城內織田信長的將領不僅受旨意為傳教士們提供方便，還捐贈建設資金，並提供免稅運送物資的許可。⁽⁵⁷⁾

陸若漢在京城逗留時日的長短並不清楚。基於從長崎來京城的旅途艱苦，也許可以認為他至少停留了幾週，甚至更長的時間，有充分的時間參觀京城這座城市。此後，陸若漢就隨傳教士或商人們一起回到九州。沒有記錄稱織田信長見過陸若漢。

有關陸若漢抵日後所經歷的事，史料中記載比較清晰的第二件便是“耳川戰役”。這場戰役的發起源於日向的伊東家和薩摩的島津家持續了幾代人的宿仇，兩家一直處於敵對狀態，時常突發戰爭。傳言歐洲人1543漂流至日本種子島時，將小兵器的用法傳授給了薩摩，從此一直處於彼此分不出高低狀態的這兩地的兵力就被打破了平衡：1549年9月島津貴久的兒子義久在1573年打敗伊東家，五年以後佔領日向，直逼近豐後的邊界線上。豐後領主大友家與伊東家有聯姻關係，當被趕出領地的伊東家投奔到豐後向大友求援時，當時佔據九州九分之五地盤的大友家認為正是擴充自己領地的極好機會，便以趕走薩摩軍隊為藉口，集結起約六萬人的兵力攻打日向。

大友軍隊的進攻初始很輕鬆，一連攻下三個城市，但豐後一方的最高司令官田原親賢陶醉於開始的勝利，因輕敵而貽誤了戰機，在關鍵時刻吃了大敗仗。在12月2日的“耳川戰役”中受到前後夾擊，大友軍的陣地全線崩潰，士氣受挫的

殘兵敗將紛紛撤退回豐後。弗洛伊斯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結果，其根本應追究膽小無能的田原親賢陶的責任。他憂鬱地寫道：

就這樣，豐後王（大友家）經多年積累起來的東西，一日之間就喪失殆盡了。⁽⁵⁸⁾

“耳川戰役”中有兩個值得關注的人，一個是豐後的領主大友，一個是剛到日本不久的陸若漢。大友義鎮原本是一名禪宗的虔誠信徒，削髮時得法號宗麟，史書中一般稱其為大友宗麟。當時，大友宗麟在九州很有勢力，在他的保護下，自1543年以後，葡萄牙商船就出入豐後別府灣附近的府內（現日本大分縣），天主教的傳教活動最初也以豐後大友的領地作為根據地。由此段經歷，“可以推測陸若漢也是在府內上的岸”⁽⁵⁹⁾，因為“耳川戰役”發生時他正在豐後，並參與其中。大友宗麟在第二年1578年以法蘭西斯克的教名接受洗禮，自此給予天主教更加優厚的待遇，成為耶穌會堅定的擁護者。陸若漢在豐後前後逗留八年，其間跟大友宗麟相處非常親密。法蘭西斯克·扎皮埃爾曾於1551年在豐後逗留期間會見過大友宗麟，對此人印象很深。庫帕稱：

如果沒有大友宗麟的支持，最初來到日本的傳教士們可能無法順利度過那個極其不穩定的時期。⁽⁶⁰⁾

大友宗麟不僅對傳教士，對所有的歐洲人都表現得格外友好。他曾經阻止殺害葡萄牙商人，積極支持耶穌會在府內建造會館，讓天主教徒們在府內學習日語。

大友宗麟率大軍攻打日向一般認為有三個目的：聲援有親戚關係的伊東家是初衷；借此機會擴大領地是其次；“開拓理想的天主教王國”⁽⁶¹⁾是其三。出於此三個目的，大友極力邀請接替克斯梅·德·特魯萊斯（Cosme de Torres）⁽⁶²⁾的法蘭西斯克·卡布拉爾（Francisco Cabral）⁽⁶³⁾加入

遠征軍一同前向日向，到那裡開展傳教。卡布拉爾立刻回應，並備齊在新傳教地所需要的各種資料，於1578年10月3日從白杵乘船前往集結地。弗洛伊斯報告說，跟隨卡布拉爾前往的有通辭若安德特爾萊斯⁽⁶⁴⁾、傳教士前輩——有病在身的路易士·德·阿爾梅達（Luís de Almeida）、十七歲的安德萊多利亞（Andrés Douria）修士、陸若漢，以及好幾名葡萄牙少年也在卡布拉爾一行人當中。土井忠生稱：

受過洗禮的宗麟當年秋天為了實現開拓天主教理想國的夢想，召集隊伍向進駐在日向的島津軍隊發起進攻。羅德里格斯也和其他外國人傳教士一起參加了這一隊伍。⁽⁶⁵⁾

“耳川戰役”以薩摩軍隊的勝利、豐後軍隊的失敗而告終。陸若漢目睹這次敗仗，在他所著的《日本教會史》有關日向的章節中，有一段關於此事的記載：

於是，法蘭西斯克先生（大友宗麟）根據他非常推崇的葡萄牙王國的法律，將該國全部民眾改為天主教徒，抱着按照天主教的法律來統治的意向，率領五萬人（軍隊）前往該地，他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將日本教區的上長巴德萊法蘭西斯科·卡布拉爾，以及耶穌會的其他巴德萊和神學生全部派去。我們也加入到這一行人中。但是吾祖智慧超群，由於豐後的人都是異教徒，而且傲慢無禮，上帝的保佑，使薩摩能夠在耳川附近打敗豐後軍隊，成為勝利者。⁽⁶⁶⁾

戰敗後，在豐後軍隊裡有很多人抱怨大友宗麟一路進軍中採取的破壞佛教寺廟的政策，甚至斷言，“耳川戰役”的失敗一定是“佛祖給予的報應”。⁽⁶⁷⁾為此，耶穌會士們擔心剛剛接受洗禮的大友宗麟會由於這次敗仗而怨恨天主教徒。“耳川戰役”之後，出現許多對天主教不利的輿論，

不少人的信仰發生動搖，大友的家臣中有人起來謀反，導致戰敗的田原親賢更是發起將傳教士驅逐出豐後的運動，耶穌會士經常會受到無禮的謾罵，懷有敵意的人們甚至要毀壞聖堂，事態驟然變得十分嚴重。此時的大友宗麟雖然喪失了往日的權威，但他依然勇敢地堅持自己的立場，擁護天主教士和耶穌會。而他的兒子大友義統則一方面私下跟傳教士們表白他在內心仍是一名天主教徒，而實際上他已經屈服於實權人物的壓力，又再次參加佛教的祭日，並向寺廟佈施。

“耳川戰役”失敗之後，陸若漢也許仍留在豐後，跟其他傳教士一起遭受來自異教徒的指責和謾罵，抱着隨時可能死於反天主教暴徒之手的精神準備。第二年年底，即1580年12月，他確實是在白杵，那年起他先後進入白杵的修道院和府內的神學院學習。陸若漢進入神學院以後的活動，隨着史料中陸續出現有關記載而逐漸變得清晰起來。

陸若漢在故國沒有受過任何教育，他的全部知識都來自耶穌會在日本的教會學校，由陸若漢的成長也可窺見日本教會於日本所取得的教育成果非同一般。從他此後被賦予編纂《日本教會史》的使命來看，陸若漢似乎更充分地展現了其過人的天賦。1591年春，陸若漢在范禮安帶領遣歐青年使節拜見豐臣秀吉時擔任隨行翻譯，以此為契機，他受到當時的統治者豐臣秀吉的青睞。此後，陸若漢接替弗洛伊斯，開始出任日本教會的“通辭”一職，負責與豐臣秀吉等日本統治階層的交涉工作。1601年擔任日本副管區司庫的重要職務，確立了陸若漢在耶穌會內部的地位，擔負起處理日本耶穌會和豐臣秀吉，以及後來和德川家康之間的外交事務的重任。之後的陸若漢更是備受德川家康的信任——受命參與長崎的葡萄牙商船和日本商人之間的貿易往來。因此，陸若漢作為翻譯，被日本人稱之為“通辭伴天連”（翻譯傳教士）。總之，出身貧寒的葡萄牙少年陸若漢終於作為一名“通辭傳教士”承擔起跟日本最高實權人物打交道的重任。

【註】

- (1) [英]邁克爾·庫帕(Michael Cooper)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原書房，頁237。
- (2) 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1章頁1，原書房，1991年1月。
- (3) [日]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62，三省堂，1982年。
- (4) 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63。
- (5) 塞爾南賽尼埃是貝拉主教區的巡禮地之一，當地有一座極受尊崇的古代聖母像。相傳此像作於8世紀，後為防止落入伊斯蘭教徒之手，被藏匿在一洞窟之中，由於年代久遠，逐漸被人遺忘，直到1493年，才被一位牧羊女偶爾發現，隨後教會特別為之建造了一座小教堂，用於聖像的安置與禮拜——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1章，頁1-2。
- (6) [法]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冊71〈陸若漢〉頁217，中華書局，1995年版。
- (7) 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73。
- (8) [葡]《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18，第86卷，羅馬，1627年11月30日。
- (9) 《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25，第11、35和104卷。
- (10) (14)(16)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1章頁2。
- (11) 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註：《日本教會史》上冊31。
- (12) (13) 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63。
- (15) 榮振華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土井忠生的《吉利支丹論考》，以及邁帕的《通辭-ロドリゲス》都註明陸若漢的出生年為1561年。
- (17) (18) 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73。
- (19) (21) 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註《日本教會史》上冊頁32。
- (20) 戚印平著：《陸若漢的學業及其知識背景》，未刊行。
- (22) 陸若漢曾說過：“是主將幼年的我召到了日本的主自己的會(耶穌會)”。
- (23) (24) 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1章頁13；頁3。
- (25) 《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25，第107卷。
- (26) 《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18，第8卷，澳門，1622年10月31日。
- (27) 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註：《日本教會史》上冊頁31。
- (28) (29)(31)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1章頁4。
- (30) [葡]考洛斯，《耶穌教亞洲系列》49-IV-59，第120卷——長崎，阿儒達圖書館，里斯本1603年10月6日。
- (32) 《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13，第132卷，長崎，1598年2月28日。
- (33) 《中日古風俗系列》，耶穌教會檔案18，第9卷，1622年10月31日。
- (34) (35)(36)(37)(38)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1章頁5；頁6；頁7；頁8。
- (39) (41)[英]博瑟著：〈歷史的悲劇〉頁24-25，載Rogers，頁131-140。
- (40) 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1章頁9。
- (42) (43)[日]弗洛伊斯著，柳谷武夫譯註：《日本史》，平凡社，東洋文庫，5冊，1987年，頁11-13。
- (44) (45)(46)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1章頁10；頁11；頁13。
- (47) 在大阪的南蠻文化館保存的漂亮屏風畫裡，在停泊的船上，以及在艦隊司令官的帶領下進入長崎的行列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有歐洲少年的身影。
- (48) 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註：《日本教會史》上冊頁223。
- (49) [葡]勞力斯(*Anfänge Laures*)編：《教會文檔》(*Schütte*)〈導言〉(*Introductio*)，頁603-609。
- (50) (51)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2章頁16。
- (52) (53)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註：《日本教會史》上冊頁223。
- (54) 1569年在佛教徒的唆使下，頒佈了天主教禁教令的也是這個天皇。
- (55) [葡]陸若漢，《信件集》1: 273卷，前揭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2章頁17。
- (56) [日]松田毅一著：《南蠻史料的研究》頁416，風間書房，1967年。
- (57) 這座教堂是為昇天聖母建造的，在日本的歷史上被叫做南蠻寺。
- (58) 弗洛伊斯著：《日本史》，頁13。
- (59) 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64。
- (60) 邁克爾·庫帕著，松本玉譯：《通辭-ロドリゲス》第2章頁22。
- (61) 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64。
- (62) 皮埃爾於1551年離開日本之前，將日本耶穌會的傳教工作交給了同事特魯萊斯。出生於巴萊恩西亞的特魯萊斯可以說是跟札皮埃爾一樣，是日本傳教活動的先驅。他不僅僅是跟札皮埃爾乘坐同一條船來日本，而且在此後不穩定的二十年中，一直負責耶穌會的不斷擴大的傳教活動，最終搞壞了身體，於1570年將工作交給了法蘭西斯克卡布拉爾，在兩三個月之後就去世了。
- (63) 卡布拉爾於1533年出生在亞索萊斯，跟陸若漢一樣，少年時來到亞洲，於1554年在果阿成為耶穌會士。不久，他的行政工作能力受到重視，被派遣到日本，接替生病的特魯萊斯，掌管耶穌會的事務。
- (64) 此人是出生於山口的日本人，並非歐洲人。
- (65) 土井忠生著：《吉利支丹論考》頁64。
- (66) 陸若漢著，土井忠生等譯註：《日本教會史》上冊頁260-261。
- (67) 過了三十多年，叛教者不幹齋巴鼻庵(Fabian)把耳川戰役的失敗仍然作為反駁天主教徒的一個例子。